

城市之聲西關音：由省至港及滬¹

程美寶

香港城市大學

提要

近二三十年，有所謂“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之說，本文認為應將這種二分法置於更長的時段和更廣闊的空間加以審視。就聲韻和音調而言，不論“香港粵語”或“廣州粵語”，均脫胎自“省城白話”，而省城白話的標準音，至遲在十九世紀被認定是“西關音”。本文從貿易發展、人群流動、歌樂傳統、現代媒體等各方面，先談“西關”作為一片地帶的生長過程，再談“西關音”如何被辨識為“標準音”，最後論述其在各粵人聚居點尤其是上海傳播的軌跡。

關鍵詞

西關音，粵語，廣州，香港，上海

當我們打開一本中國語言地圖時，會很直觀地認識到，粵語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兩廣地區，其中又可再細分為不同的“片”。廣州和香港兩大會，連同許多主要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鄉鎮和鄉村，同被劃入“廣府片”。不論憑專業知識或是日常生活經驗，我們都知道，在同一片之中，各城、鎮、鄉村甚或聚落的人們所說的粵語，在聲調、語法和用詞上，都會有所差別。然而，在近二三十年的討論中，這類差別以廣州和香港兩地之間被談論得頗多，甚至可以說是被放大以致引起許多誤解。作為一個歷史學徒，我之所以會對粵語的歷史感興趣，跟我個人的生活經驗和多年來幾方面的研究有關。我在香港出生成長，20年前到廣州工作，每跟“香港人”接觸，他們以為我“生在廣州”，便會說我講的是“廣州廣東話”，有別於“香港廣東話”，即使後來知道我是“香港人”，也會說我的廣東話被“廣州化”了。2017年夏天，我在梧州，與一位當地的老師聊天，她知道我從香港來，又說“你們香港人的廣東話特別好聽”。大家都知道，兩個人首次見面如何互動和對話，與彼此對對方的背景的認識、假設和想像是有關的。由於我這種“省港兩地不是人”的經驗，我開始對兩地各種人群的廣東話口音特別注意，我非專業的結論也很簡單：“香港人”當中的粵語口音千

¹ 本文是筆者在第二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2017年12月8-9日，香港）上所做的主題演講的簡寫本。

差萬別，在所謂“廣州人”當中情況也是如此。假如我們從任何一個人群中，請出一個“香港人”和一個“廣州人”來比較一下他們的粵語，你一定能找出差別，但這些差別不是“香港”和“廣州”的差別，而是因為 A 君與 B 君因其他許多方面的因素而導致的差別。何況何謂“香港人”和“廣州人”也不是一張身份證或一個戶口本便可以界定。

誠然，經歷了數十年的政治和行政區隔以及代際更替，我們不能說省港兩地沒有分別，但是，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聲調這個更根本的元素上，便應該知道，所謂的“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的一致性，遠遠高於粵語地區任何兩個鄰近城市（如廣州與佛山；香港與東莞）或同一城市內（如廣州的老城區西關與城內東山，還有城區與郊區、北郊與南郊；香港的港島市區與新界，甚或新界不同鄉村），或香港和廣州不同鄉籍背景的人群（如中山人、順德人）所講的粵語的一致性。要知道，香港和廣州兩個城市距離 120 公里之遙，幾乎不能說是“鄰近”城市，而據我粗淺的認識，中國沒有任何兩個鄰近的城市的語音（如北京和天津，上海和蘇州）的相同性能與廣州和香港這對“雙子星”可比。道理本來很簡單，香港人普遍認定的“香港話”，其實是“廣州話”（Cantonese），用一個更老舊的說法，是“省城白話”。筆者曾不厭其煩地在不同場合申明，“Cantonese”的“Canton”是指省城，不是指廣東省；而“白話”中“白”的這個比喻，大抵就是指沒有染上任何色彩——即“鄉音”——的意思。再嚴格一點說，就聲調而言，所謂“白話”，其標準音從某時期開始被認定為“西關音”。要明白何謂“西關音”，便必須從“西關”這個地帶從無到有講起。筆者是個歷史學徒，本文也因此採用歷史的視角，從貿易發展、人群流動、語言教育、本地歌樂傳統、現代媒體運用等各個方面，先談“西關音”如何被辨識為“標準音”，後談“西關”作為一片地帶的生長過程，再從歌樂文化的角度，討論這種口音在各粵人聚居點尤其是香港和上海傳播的軌跡，從而將“香港話”置於一個更長的時段和更廣闊的空間去理解。

辨識西關音

筆者迄今所見較早提出“西關音”這個說法的，是 James Dyer Ball 在其 *Cantonese Made Easy* 一書初版（1883 年）中所寫的前言。在該前言中，James Dyer Ball 提出讀者該學的是“純正廣州話的正確發音”（“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pure Cantonese”），並謂：“即便在省城一處——純正廣州話的所在與中心——[語音]也有細微的差異和劃分，每個字詞有多於一個發音，然而，學習者當以西關音（Sai Kwán wá, or West End speech）為標準。”（Ball 1907 [1883]: XV,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換句話說，所謂“省城白話”，也有局部地區性的差異，Ball 要編寫教材，教外國人學白話，自然有“正確”、“純正”和“標準”等概念，才能在教材裡為每

個字標音。Ball 雖然是“外國人”，但他生在廣州，掌握的是當時本地人的概念，應該是十分地道的。至於中文文獻有關“西關音”的說法，筆者孤陋寡聞，尚未系統梳理，迄今見到的已是遲至民國年間出版的書籍——譚榮光的《粵東拼音字譜》（1934年）。在該書中，譚提出：“吾粵方言向以西關音為標準，故是書亦以西關音為根據。”（譚榮光 1934: 12）

何處是西關？

“西關音”以“西關”為地域界定，也恰好由於“西關”地理方面的性質，讓我們可以推敲“西關”和“西關音”這個說法，不會早於18世紀出現。所謂“西關”，大體是指廣東省城城牆外以西，北至第一津，南至沙面，西往泮塘方向逐步延伸的一個區域。西關成陸是長年以來河灘自然沖積和人工堆填的結果，經歷了一個由北而南，自東向西的延伸過程。已故的地理學家曾昭璇先生有關西關地區珠江河岸線的演變的研究，提醒我們不能把西關地區蓬勃發展的歷史推至太早。這個過程跟1757年清政府限定外洋貿易在廣州一口，外商不能入城，商館（時人稱“夷館”）只能設在城牆以西有關。從早期的外銷畫或牆紙看，18世紀中左右的“西關”，還是陸海難分，正好符合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謂“廣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場，自龍津橋以至蜆涌，周迴廿餘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的說法（屈大均 1985: 704）。18、19世紀間，西關地區因洋行生意蓬勃變得十分繁華，這在外銷畫、地方誌書和外國人的遊記都有所反映。²

成為廣州人

“西關”作為一個有文化意涵的地理概念，最早大概在18世紀中才出現。按清代的行政規劃，廣州城由南海、番禺兩縣分治，縣城與府城同時設在廣州；兩縣分治之地，均由督捕廳直接管轄，故兩縣縣志均稱這些地方為“捕屬”。西關地屬南海縣，亦屬“捕屬”，由捕房而非巡檢司管治。因此，比較而言，在西關居住和營生的人的白話口音，很可能更接近南海，同時也必須注意的是，由於西關是個“商業區”，在此營生者尤其是顯赫的洋行商人（一般稱十三行商）不少來自福建，他們在廣州落地生根，經歷了一個“成為廣州人”的過程。他們的第一代說的可能仍然是家鄉的語言，但這些家庭在廣州出生的第二代，學的講的應該就是省城白話了。行商定居廣州省城、西關或珠江以南的河南島後，儘管有入籍番禺也有入籍南海的，但由於西關地處南海，在西關營生的人群，講的白話很可能更接近南海口音，“西關”逐漸成為繁

² 關於西關的形成更詳細的討論，可參考拙文《破牆而出：清末民初廣州西關地區景觀的延續與變遷》（程美寶 2012）。

盛富裕的地標，“西關音”也因而變成一種文化身份的標誌。這和後來崛起的香港和“香港話”（或香港粵語），在被辨識和界定方面是同出一轍的。

珠娘唱粵謳

筆者認為，就聲韻和音調這兩個最本質的元素論，“香港粵語”秉承的是“西關音”，這從香港人最引以自豪的粵語流行曲的叶韻調聲的準則最能說明問題。我們都知道，粵語流行曲填詞一個最重要的準則，是符合“粵語”的聲調（傳統的說法即“九聲”），但這到底是指何處或何種粵語的聲調呢？假設我們以《中國語言地圖集》為準，香港和廣州位處“廣府片”地區，而所謂“廣府”，若按清代“廣州府”的行政劃分，則包括了十四個縣（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清遠、三水、從化、增城、龍門、新會、新寧、新安、花縣）。我們不用做調查，僅憑常識和印象，便知道這各縣各鄉所說的粵語的聲調都千差萬別。粵語流行曲“誕生”於香港，我們是否就能說粵語流行曲填詞時需要符合的是“香港粵語”呢？香港在清代屬新安縣管轄，尤其是新界地區一直到 1898 年之前仍屬新安縣管轄，我們能否說“香港粵語”，就是新安縣人（按過去殖民地政府的人群劃分再分為“本地”、“客家”和“疍家”）說的粵語呢？即便是今天，人們判定是否“香港粵語”的準則仍然是“是否有口音（accent）或鄉音”，人們普遍認定“沒有口音就是好的口音”（no accent is good accent），就是夠“白”（沒有顏色）。那麼，所謂“香港粵語”，就是“白話”，就是隨着港島自 1842 年開闢為商埠，從珠三角地區陸續來到這個新埠頭的人所說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亦即上述的以“西關音”為準的省城白話。用省城白話叶韻調聲而成就的本地歌樂文化，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紀初流行於珠江花艇的南音和粵謳，南音至今固然仍有傳唱，粵謳也有曲譜和錄音可循，兩者比起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完全改成粵語結合板腔和歌謠兩種體系的“粵曲”，早了足足一個世紀。

省港同一體

我們不妨再論述一下廣州、香港和澳門在歷史上的關係，以說明省城白話西關音成為“通用語”的過程。過去，我們經常會聽到某種商品“馳名省港澳”的說法，其中，“省港”的說法（如“省港班”、“省港大罷工”、“省港杯”）又十分常見，但“省澳”則幾乎未聞。一個也許能夠說明這個差別的語言現象是：許多長年居住在市區特別是港島的“老香港”所講的粵語，總的來說是廣州的西關口音，而在許多長年居住在澳門市區的“老澳門”當中，西關口音亦隨處可聞，但總有些人是帶有中山音的。廣州與澳門之間沿珠江口上下往來的航行路線由來已久，廣州與港島之間倒是遠隔大洋，且至香港開埠後才真正變得交通頻繁，但“省港”的口音遠比“省澳”

接近，理由何在？我們不妨再換個問題：香港本屬新安縣，新安縣乃從東莞縣析出，新界地區的居民的口音許多是東莞音，水上居民也有自身的口音，為何香港的“城市之音”不是東莞口音或後來稱為“原居民”的口音？要知道，九龍和新界地區，分別是在二次大戰後和 20 世紀 70 年代才更大規模地被整合到城市發展之中的，英國人在香港開埠頭半個世紀裡，主力發展的是港島北面面向維多利亞港沿岸至山頂一帶。到香港尋求謀生機會的，不錯也有來自珠江三角洲各地甚或潮州地區的人，方音也自不相同，但陸續到香港的華商，追循的仍舊是廣州西關商人的談吐舉止。這批華商的經濟實力，也很快與英商分庭抗禮，自 19 世紀 80 年代開始，“中上環半山區”逐漸成為上層華人聚居的地段。華人特別是華商的流動性使三地的華人社區（甚至是省外和海外的粵人社區）逐漸發展出一些共同的都市景觀和社會機構。香港中上環的華人社區幾乎就是廣州西關“立體化”的呈現，澳門填海擴大的下環地區，也有類似的景觀。省港澳三地還不止在景觀文化的類同，而更在於人情網路之相通。華商因為做生意的需要，在各地開設聯號，家分幾頭的情況比比皆是。由於澳門到了 19 世紀末之後在經濟和交通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不大，市場容量亦相當有限，加上自 1911 年通車的九廣鐵路，更大大促進了省港兩地的聯繫，而廣州澳門之間的鐵路，卻遲遲仍屬紙上談兵。因此，真正旗鼓相當的兩個城市是廣州和香港，實際的經營運作也主要是依賴“省港”這個杠杆。換句話說，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省港兩地在政治制度上固然有別，但人們的文化和生活習慣是一體的，共享着一種“城市之音”。³

滬上擴音聲

要更確切地理解 20 世紀中以前的省港澳，不能沒有大上海。從 19 世紀中開埠之後，滬上便有大量的廣東人當買辦做生意，至 1934 年左右，旅滬粵人大約有三十萬餘人之多。民國時期的上海，因此能處處聽到“廣東聲音”。這種以“省城白話”為標準的“廣東聲音”，在各種音樂頑家的同樂會中流傳着，在戲園或戲院裡逐步發展着，再借靠廣播技術的興起通過大氣電波得以無遠弗屆地遠近共享。以粵劇戲班論，1919 至 1937 年間，堪稱粵劇在上海的高峰期，不但上演次數頻繁，來滬演員和戲班名氣之高，更是前所未有。粵曲歌伶若在省港一時無立足之地，澳門市場又太小，往往也會去上海廣東人經營的茶樓演唱謀生，酬金比省港更為豐厚。在音樂方面，匯聚在上海的粵籍音樂玩家，與來自其他地方的樂手頻繁交流，吸取諸多外來養分，同時也在改造和創制自身的地域文化，創作“廣東音樂”。隨着粵語在粵劇的唱腔和念白中應用日廣，人們又在廣東音樂甚至國語時代曲上填入粵語歌詞，創作出一批獨立於粵劇

³ 此節進一步的論述，可參閱拙文《從“省港澳”到“粵港澳”：歷史失憶與現實定位》（程美寶 2017）。

椰簧系統之外的粵語小曲，這些粵曲也許不像同時期的國語時代曲一樣流行全國，但它們同樣借靠了唱片灌制等技術手段，得以大量複製、留存和廣播。這樣的形式又逐漸與傳統粵劇融合，為後來三、四十年代漸以粵語為主體演繹的粵劇增添了新鮮的養分。與此同時，灌制唱片和無線電廣播等現代的技術手段進一步把已經逐漸形成自身特色的粵曲和粵樂加以發揚和流傳，而由於當時廣播的技術和人才都集中在上海，粵曲粵樂的錄製，不少都在上海進行，其中尤以在香港、上海和廣州都有生意的粵人錢廣仁經營的大中華留聲唱片公司和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為最著。因為香港缺乏適合的場地和熟練的錄音師，很多錄音在上海進行，或需要“特請滬廠派技師到港來”，才能夠完成灌音工作。廣播方面，自1923年第一家電台在上海創辦至1949年，上海的公私營電台一直播出廣東節目，包括粵曲、粵樂及粵語新聞。1934年上海有7家電台播出廣東節目，1939年有16家即將近全市一半的電台播出廣播節目。⁴ 換句話說，依託於省城白話（西關音）的粵語歌樂文化，在上海得以擴大影響，不僅“留聲”，更能“廣播”。1949年之後從內地來港與粵語歌樂和廣播文化有關的人才，不少都是來自上海的粵人，經營“新興電台”的胡章釗，來港後轉型為電視節目主持人，有“金牌司儀”之美譽，即為其中的表表者。

小結：“城市之聲”的意涵

充滿悖論的是，“西關音”雖然指涉的地域非常狹小，但其象征“城市之聲”的文化意涵卻跨越階層與地域，由省港澳滬延及世界各地粵人聚居的大小埠頭。這套“九聲”的源流或可追溯到早已在歷史上出現的行政區域（南海），但“西關”這個帶有文化意涵甚至評價性質的地名和標籤卻不會早於18世紀出現，而18-19世紀恰恰是依託於西關音的粵語歌樂文化興起的時候。19世紀中，港島割讓予英國，開闢成商埠，西關音作為省城的標準音也由此成為省城、香港及其他粵人聚居的埠頭共享共用的城市之聲。1949年以後，廣州和上海經歷了較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遷，香港反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延續了原來省港一體的文化。時至20世紀下半葉，“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的差別越來越被突出，筆者認為，與其說兩者有本質上的差別，不如說差別在於“香港粵語”更能保持“西關音”，也就是保存了更“古舊”的省城白話的味道，而不是它有多“香港”。當然，隨着世代變遷和人口變化，所謂“香港人”和“廣州人”兩個“類目”，自身當中也有許多差異性，“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到底是否有意義的二分，更值得我們反思。

⁴ 此節進一步的論述，可參閱拙文《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紀二、三十年代粵劇、粵樂和粵曲在上海》（程美寶 2007）和宋鑽友：《播音裡的廣東聲音：兼論地域文化在上海傳播的原因》（宋鑽友 2017）。

參考文獻

- Ball, James Dyer. 1907 [1883]. *Cantonese made easy*. Singapore–Hong Kong–Shanghai–Yokohama: Kelly & Walsh, Limited.
- Cheng, Meibao (程美寶). 2007. Jindai difang wenhua de kuadiyuxing: Ershi shiji er, sanshi niandai Yueju, Yueyue he Yuequ zai Shanghai 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紀二、三十年代粵劇、粵樂和粵曲在上海 *Jindaishi Yanjiu* 近代史研究 2. 1–17.
- Cheng, Meibao (程美寶). 2012. Poqiangerchu: Qingmominchu Guangzhou Xiguandiqu jingguan de yanxu yu bianqian 破牆而出：清末民初廣州西關地區景觀的延續與變遷 In Jilang Su (蘇基朗) (ed.), *Zhongguo Jindai Chengshi Wenhua de Dongtai Fazhan: Renwen Kongjian de Xinshiyue* 中國近代城市文化的動態發展：人文空間的新視野, 180–201.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Cheng, Meibao (程美寶). 2017. Cong “ShengGangAo” dao “YueGangAo”: Lishi shiyi yu xianshi dingwei 從“省港澳”到“粵港澳”：歷史失憶與現實定位 In Meibao Cheng (程美寶) & Sujuan Huang (黃素娟) (eds.), *ShengGangAo Dazhong Wenhua yu Dushi Bianqian* 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 1–18.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Qu, Dajun (屈大均). 1985. *Guangdong Xinyu* 廣東新語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Song, Zuanyou (宋鑽友). 2017. Boyinli de Guangdong shengyin: Jianlun diyu wenhua zai Shanghai chuanbo de yuanyin 播音裡的廣東聲音：兼論地域文化在上海傳播的原因 In Meibao Cheng (程美寶) & Sujuan Huang (黃素娟) (eds.), *ShengGangAo Dazhong Wenhua yu Dushi Bianqian* 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 325–352.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Tan, Rongguang (譚榮光). 1934. *Yuedong Pinyin Zipu* 粵東拼音字譜 Xianggang: Dongya Yinwu Youxiangongsi 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

“West End Speech”: The Sound of Urbanity of Canton and Hong Kong That Expanded to Shanghai

May Bo Chi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ore dynamic approach to looking at the dichotomy of “Hong Kong Cantonese” and “Guangzhou Cantonese”. Adopt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with regards to sounds and tones, both “Hong Kong Cantonese” and “Guangzhou Cantonese” evolve from the “*baak waa*” spoken in the provincial city of Guangdong in the Qing period, of which the “standard” was identified as the “West End speech”. Address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movement and migration, musical tra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a in particular the gramophone and radio broadcast,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the “West End” evolved from marshlands to a commercial-residential district between the 1700s and 1800s, how “West End speech” was identified as the “standard” speec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how it was amplified via a Cantonese musical culture in Shanghai and elsewhe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West End speech, Cantonese, Canton, Hong Kong, Shanghai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九龍塘 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及歷史學系

電郵地址：mayching@cityu.edu.hk

收稿日期：2019年8月7日

接受日期：2019年9月23日